

海外新移民与当代农村文化变迁 ——基于福建沿海 J 村的调查分析

孟庆梓*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作为当代农村人口流动的一种新现象, 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对迁出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以福建沿海 J 村为个案, 通过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变、个人价值观念更新以及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变化的依次分析, 从微观角度对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农村文化变迁进行解读, 指出该现象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发生博弈、变异与融合的复杂过程, 并呈现出“双刃剑”效应。

[关键词] 新移民; 出国移民潮; 农村; 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08) 01-0018-07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末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国际间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与国际移民环境相适应, 中国出国移民潮也迅速兴起。据有关学者统计, 1978 年至 2003 年, 中国大陆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途径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 约在 250 万至 280 万之间。其中, 来自农村地区特别是福建、浙江和广东等沿海侨乡地带的新移民群体占据了较大规模, 并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

大量人口跨境迁移行为的出现, 势必给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影响。特别是随着迁移网络与规模的不断拓展, 在迁出地某些特定村庄或街区往往有大量青年男女成群离开, 进而导致家庭和社区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斯蒂芬·卡斯尔斯, 2001),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还反映在文化方面。并且, 相对而言, 文化方面的变化表现得更为“含蓄”和深刻。如何认识作为移民迁出地的农村文化变迁不仅成为学术上的一个“难题”, 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该问题的顺利解决, 对于充分认识当代农村人口出国移民潮的社会效应, 以及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均有重要价值。

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福建沿海 J 村为研究个案, 充分运用实地调查材料与相关文献资料, 对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农村文化变迁进行解读, 并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框架内做些探讨。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本人多次前往 J 村收集到的实地调查材料, 并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J 村位于福建中部沿海一带, 这里既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侨乡, 也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现象凸显

* [收稿日期] 2007-11-01

[作者简介] 孟庆梓,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史、华人社会文化。

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 [J]. 世界民族, 2006 (3)

一般含义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

的活跃区。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为了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 实现求富的理想, 先后有数百 J 村人通过各种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谋生, 对村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村委会记录资料显示, 截至 2004 年, 该村在海外 (包括港澳地区) 的新移民群体中合法定居者共有 552 人, 占了全村总人口数的 1/5 强。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 村内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国打工。就其周围环境而论, J 村所在的镇辖区、市辖区均是中国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活动频繁的典型地区。这种实况与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市 (青田县), 以及广东省江门市、梅州市等农村出国移民潮迁出地聚集区有着颇为一致的人文地理环境。因此, 考察 J 村个案对于认识我国当代农村人口出国移民潮的整体社会文化效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在资料收集方式上, 笔者主要采用了社会人类学中参与观察的方法, 并以非随机抽样的原则走访了 J 村数十个出国人员家庭 (涉及新移民人数 100 人以上), 对新移民家属和部分返乡新移民进行深度访谈, 获得了许多真实、深入的一手材料, 同时也从当地村委会、镇侨联得到不少相关数据资料。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文将结合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展开讨论。

三、实证调查状况解析

概括来说, 农村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 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的文化”, “包括共同理想、感情、信念、价值观、道德、风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精神文化”。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主题, 这种概念内涵则主要呈现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三个方面。

(一) 传统生活方式的转变

1、闲暇时间的增多与生活形式的多样化

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前, J 村农民的生活形式主要集中在以农耕和渔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中,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天都为生计而辛勤地忙碌在土地上或海滩上, 生活是单调的三点一线: 起床、劳作和睡觉。村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思考休闲娱乐的事情。

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 村民的生活规律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于新移民丰厚侨汇资金回流的持续供给, 当地农民家庭在经济上迅速致富, 用村民自己的话说, “我们早就小康了。”由此, 当地村民家庭成员也不必再去为了生计而整日束缚在土地或海滩上辛苦劳动。在这种情况下, 村民的生活形式迅速转变。

如今, 在 J 村的生活场景中, 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导的传统生活形式正在逐渐解体, 多样化的现代闲暇生活形式日益占据主导。老人们吃过早饭后可以任意安排自己一天的活动, 或在家里看电视和照看孩子, 或到外面聊聊天, 打打纸牌, 看看戏, 看看电影, 乃至是出国旅游。即便是少数依然劳动的老人们也只是把少量的生产劳动作为一种放松的消遣, 而不再有什么生活压力。妇女们也一律变得轻松起来, 一天的时间里, 或是照看幼年的孩子, 或是种种果树, 或是在家编织, 或是与老人一样的出去聊天、打牌。孩子们则是按部就班地上学读书。整体来看, 除了缺少家庭团聚的温暖, 整个村中的生活却也是其乐融融。此外, J 村还成立了专门负责老年人娱乐的“老人会”, 以及专门为村、镇盛典活动表演的文艺队、腰鼓队等多种文娱组织团体。这些民间组织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村民们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也使村民的闲暇生活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由于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构成往往以青壮年为主, 平均年龄一般在 30

肖桂云, 张蓉.农村社会学 [M].北京: 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99.

J 村新移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打工的年收入一般在 5 万元至 20 万元人民币之间。考虑到农村出国人员在国外生活的普遍节俭, 以及按照村民们的普遍说法: “全村 (国外) 打工的 70%-80% 的钱都会寄回来”, 所以几年下来, 一个农民家庭仅靠国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积累资金。

岁左右 (朱美荣, 2001), 且以男性居多。因而逐渐导致村内留守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和幼龄化以及女性化的方向转变。在这种状况下, 村民的生活主题便突出地体现在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方式中,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村“精英”文化则日渐淡化。

2、消费结构变动中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

改革开放之初, J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基本处在只求温饱的低级阶段。村民的消费结构是以传统的吃、住、用、穿降序排列为标志的落后消费格局。尤其是其中的食品消费部分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 随着海外侨汇资金收入的迅速增多, J村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很快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据村民的普遍反映与笔者的仔细观察, 目前J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已变为: 住、用、吃、穿的降序排列状态。其中建房消费比重跃居第一位, 而饮食消费比重则退居到第三位, 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这种消费结构序列的变化表明J村村民的生活水平正遵循着从“温饱型”向“享受型”的方向前进。

当然, 消费结构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完全合理化。例如, 村民建房一项费用支出额所占消费总支出额的比例过于巨大, 据村民反映,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新盖的房子大约有100座, 其中绝大部分是新移民家庭所建。这些房子的成本普遍较高, 从30万元左右到100万元左右不等。虽然每栋数百平方米的“豪宅”非常舒适, 但由于往往只有一两个留守成员居住, 因而造成消费资金的很大浪费。与此同时, 村民的衣食水准却依然较低。据笔者观察, J村留守群体(老人、妇女和孩子)在日常的生活中普遍衣食简朴, 很难让人知道他们竟是拥有数十万元资产的家庭成员。在此, 建房投入的“奢侈性”与衣食消费的“节俭性”共存共生, 这种现象反映出在当代出国移民潮的冲击下, 农村文化形态变迁并未实现完全和谐。

(二) 个人价值观念的更新

出国移民潮的巨大效应不仅仅停留在社会文化的表层, 而且还进一步渗透到农民个人心理价值的微观层面, 进而也引发了村民个人价值观念的更新。

首先是农民求富意识的不断强化。在调查中, 笔者深深地感到, 如今的J村农民价值观念早已不再是固守农耕只思温饱的小农意识状态。代之而起的是以“走出去、多赚钱、快致富”为导向的新价值观念。为了能够迅速致富, 他们可以冒险远渡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可以忍受国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 还可以牺牲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正如当地一位侨联工作人员谈到的, 现在许多当地人800—1000元的国内工作都不愿干, 因为他们的追求早已不是生活稳定的简单层次, 而是转到以迅速致富为终极目标的更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 当代农村人口出国移民潮的兴起也正反映着这样的一种实象, 即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一些农民为了寻求更大生存、发展空间而主动作出走出乡土、跨越国界的自觉行为尝试。

其次是农民竞争意识的不断强化。在J村农民向海外迁移的发展进程中, 生存竞争价值观念支配下的“相对失落感”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这反映了农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内在竞争意识日益凸现。当被问到出国动机时, 有些村民的答案是模糊的, 但却又是深刻的, “别人出去都富了, 自己也要出去”、“他们在外国能行, 为什么我不行?”。

再次是农民自我价值实现意识的不断强化。对于目前J村村民来说, 出国打工赚钱已经并不只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而是就这种过程完成的本身而言, 它还是一种“事业”成功的象征。在这种情势下, 成功赚钱的新移民往往需要用社会地位、声誉等外在的象征资本来展示自己的某种“社会价值”。换句话说, 赚了钱的村民们已经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意义, 并有着实现这种价值的某种强烈愿望。就J村新移民而言, 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主要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 建房与捐款。

如前所述, J村新移民返乡后, 最大一项消费就是投资数十万元盖“别墅”。其首要动机是为了

让别人看到自己出国是赚了钱，以展现自己的某种成功。这种动机从本质上讲反映了新移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要求。在实现这种需求的过程中，出国人员个体往往是以村内业已形成的某种“共同认可的群体价值观”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村民 S Y 对此的解释颇为深入，“在我们农村，一个家庭能有什么大事？说起来就是结婚、生孩子、盖房子。我们村子里，还没有人因为家里穷而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的。那么他（出国者）在外面成功了，他的成就感体现在哪里？他赚了很多钱体现在哪里？就是盖新房子，既要盖大的，样式又要新颖，装修还要豪华。出国了，家里人如果还住在旧房子里，好象是很丢面子的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具有一定传统性的炫耀意识、攀比意识不但没有减弱，相反还有加强的趋势。在此，可以肯定地讲，村民们在靠劳动致富后产生自我价值的追求是合理的。然而，把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集中在建房投入的过度攀比上则是不当的。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不是建立在对集体、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之上，而是带有一种误导的片面性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J 村新移民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这就是捐献公益事业。目前，新移民对于公益事业的捐献范围已经涉及修路、建桥、安（路）灯，组织“老人会”、文艺队、腰鼓队，以及救济村内贫困中学生等多个方面，捐款金额高达数十万元。通过捐献集体公益事业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从社会价值标准的角度去衡量个人价值的，因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总之，出国移民潮的兴起推动了农民心理价值观念的迅速更新。这种更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求富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他们远赴世界各地的空间开放性意识已经明确反映了村民由传统的保守型价值观念向现代进取型价值观念的转变。而捐资公益事业的行为本身则更是体现了他们向现代性健康文化道路迈进的要求。在这里，农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了彼此合理调适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农民传统文化特性中的炫耀意识与攀比意识也同样得以演进，这是我们应该注意调整的。

（三）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解构与异化

当整个文化结构发生变迁时，原有规范的镶嵌就失去了意义（周怡，2004）。当代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在推动 J 村社会文化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的同时，也促使当地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受到巨大冲击。

1、老年人赡养问题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却使这种传统规范在现实中被逐渐解构。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移民赡养义务的弱化。由于国外工作比较繁忙或出于往返机票成本过高等因素的考虑，J 村出国人员往往一两年甚至几年后才能回村探亲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受到了严峻的现实挑战。如今，出国人员的孝心只能以经常往家寄钱付养老费和打电话问候的方式来努力实现。而原来最基本的膝下尽孝方式则日渐式微。尽管金钱物质方面的扶助也是赡养义务中的重要一环，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如何精神方面的亲情呵护始终还是赡养义务中一项必要内容。

二是老年人自身伦理价值观念的异化。令人诧异的不仅是出国在外的年轻人正在行为上解构着尽孝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且连老人本身的观念也向与传统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主要体现在老人对于自身与子女之间相互责任与义务的认识变化方面。调查中，不只一位老人对笔者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孩子）回不回来没太大关系，能多挣些钱就行，给我们寄钱就好了，我们不用他们养老。”由此可见，老人们自身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理解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而且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金钱”的价值似乎起到了某种强劲作用，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2、未成年人抚养问题

由于长期在国外从事繁忙的劳务,新移民回国的频率一般较低,有时甚至是两三年才回家探亲。因此新移民与子女之间往往是聚少离多。这种情况造成村内滞留的一些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教育问题日见突出。

其一,关于未成年人的生活成长。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J村出国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成长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未入学之前,一般是和母亲一起住在外婆家。第二阶段是到上学年龄时,再和母亲一起回到J村小学读书、生活。如果母亲也出国了,那么孩子一般是留在村内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这种状况表明,出国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往往是在缺少父爱母爱的环境中成长的。尽管处于幼年的孩子一般对此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以后,特别是与其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同学相处时,才会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并对父母产生越来越强的思念感。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没有家长的有效监护,这些未成年子女面对生活的态度一般会朝着两个相反方向发展,或者因为过多的独立处事而变得早熟、懂事,并且节俭,或者由于自控能力的降低而变得放纵、顽劣,并且浪费。

其二,关于未成年人的学校教育。根据J村中小学校长、老师以及部分学生的普遍反映,出国人员子女的学习状况总体上看是不太理想的,这些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父母出国行为的强烈影响。原中学校长C.J先生谈到,“在中学里,差不多每个班有将近30%的学生家长在国外打工。我们对他们管理上严格,但是不好管,他们心太散,老年人(祖父母)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监护,他们的成绩受到不小影响。”中学教师M.J女士谈到,“由于他们的父母在国外,所以这些孩子的家访不太好做,开家长会时,他们往往让老人(祖父母)或亲戚代替,效果不理想。现在不少学生也已经出国或打算以后出国。”

由此可见,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跨境迁移者出国赚钱的行为已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成年子女的学习态度、生活成长等方面产生强烈作用。在出国人员逐渐“脱离”对子女监护责任的过程中,未成年人无论是在学习态度上还是价值观念上都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效应的存在为当地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最终全面实现埋下一定的潜在隐忧。

3、婚恋模式问题

首先是村民传统恋爱方式的变化。如今,以传统的媒约方式谈婚论嫁惯习在J村已经日见淡化。对于当代村民来说,自由恋爱的婚嫁方式已经不再感到陌生,相反却正在成为当地青年人恋爱实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特别是年轻新移民更是在这方面保持着“领跑”的姿态。

两个孩子均在国外的村民L.Z大方地对笔者谈到,“现在我们这里都是自由恋爱,不找媒人。出不了国的在家乡自己找,出国的让他在外面自己找。但是他们要找中国女孩才行。”从中可以明确看到,J村的恋爱方式已经从传统“媒妁之数”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文明的自由恋爱风俗。并且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年轻的新移民起到了先锋作用。因为未婚的男孩和女孩一般会长期呆在国外,如果介绍家里的对象来“相亲”,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自然便会很快认可子女在国外自己寻找伴侣的做法。另一方面,这番话还揭示了村民的这样一种内在规范,就是一定要找中国女孩。这种内在要求表明了国内的家属们还是希望出国者能够保持中华民族的本性。这反映出在向现代自由婚恋观的转型中,传统的中华文化观念依然发挥着强劲作用。

其次是夫妻生活模式的变化。如前所述,由于一些出国人员常年在海外打工而很少或数年之久才回家探亲。所以,这些单身在外的丈夫与国内妻子之间的生活模式是处于分居状态。这种夫妻生活的模式与传统的“长厢厮守”模式是明显对立的。在“独守空房”的时期,年轻的妻子一般会先回到娘家生活几年,直到孩子可以上学了再和孩子一起回到J村,从此便在J村的婆家永久性地生

活下去。

守在家里的妻子从内心上来讲是孤独的。虽然可以经常和国外的丈夫通电话，也会经常收到丈夫国外一笔一笔的钞票。但客观而言，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对丈夫的需求都是强烈的。为了打发这种无奈，村里的妇女们往往会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当然，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分居而导致了夫妻感情的逐渐淡化，也出现了个别男子国外变心或女子在村里不轨的行为，从而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婚姻道德规范。

以上分析显示，出国人员正在以自身跨境迁移的行为客观上冲击着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逐步走向解体。这种文化规范解体的过程是复杂的，它不仅是原有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单向解构，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某些传统道德规范自身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既呈现出自由婚恋观等朝健康文明的现代性文化方向迈进的积极趋向，也发生着扶老携幼、夫妻相守等传统性文化道德的“相对失落”。尽管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本身得以一定程度的重新被建构，或者由于留守家庭成员的自我“忍耐”与“放纵”等缓冲状态的存在，进而使得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解体暂时并未引发整个村落文化秩序的失衡与紊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可以永远保持稳定，相反，随着当地海外移民潮的持续发展，这一文化失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仍存在逐渐增大的潜在可能性。

四、结论

通过对典型个案 J 村文化变迁的实证考察与分析，本文就当代农村出国移民潮的社会文化效应问题得出如下一些可做进一步探讨的结论性认识：

（一）出国移民潮的兴起促使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以农业劳动为主导的传统生活形式日益被多样性现代闲暇生活形式所替代，原有消费结构发生很大改善。然而，在此转变中农村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进程也并非完全“和谐”。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村“精英”文化的淡化，以及消费结构变动的非合理性都亟待科学发展观来正确引导。

（二）出国移民潮的兴起推动农民传统性的封闭性、保守性价值观念向现代性的开放性、进取性观念转变。然而，与此同时，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特征中的炫耀意识与攀比意识也同样得以前进。

（三）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导致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发生强烈震荡，并趋向解体和异化。其中既有健康向上的现代性道德文化更新，也有传统性道德文化的“失落”。尽管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解体暂时并未引发整个村落文化秩序的失衡与紊乱，但是其潜在的文化失调危机依然存在，并有可能在将来被引发。

（四）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农村文化变迁，也暗含着“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较量”。一方面，在现代进取性、开放性的驱动下，农民纷纷出国打工赚钱，获取高额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出国人员的迁移行为本身又强烈冲击着当地农村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巨大变动。在此，“传统”和“现代”并非是纯粹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个极端（同晓虹，1998），而是传统性民间文化与现代性经济行为发生碰撞与融合的过程。

总而言之，作为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一种特殊类型，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农村文化变迁过程正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发生博弈、变异与融合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有鉴于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抓住出国移民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并在具体分析与对待的基础上正确引导农村社会文化沿着健康的现代化道路前进已成为必要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1] 斯蒂芬·卡斯尔斯.21 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3）.
- [2] 朱美荣.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其相关政策初探 [J]. 人口研究，2001（5）.

- [3] 陈小左. 移民浪潮 [J]. 南方人口, 1986 (2) .
- [4] 李明欢. “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 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 [J]. 社会学研究, 1999 (5) .
- [5] 李秋洪. 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 [M].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2.140- 146.
- [6] 周怡. 解读社会: 文化与结构的路径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95.
- [7] 李宏规. 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家政策 [M]. 南方人口, 1997 (3) .
- [8]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21.

New Oversea Emigrants and Its Impacts on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Rural Areas: A Case Analysis of J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Meng Qingzi

History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rural areas, the rise of emigration wave to the oversea countries has affected greatly on the social culture changes of the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J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local social culture from micro-level caused by contemporary emigration wave to the oversea countries by focusing on the changes in life style, individual values and traditional ethics. This emigration wave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ith the fights, variations and melting of traditions and the modern, which are both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rural areas.

Key words: New migrant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wave; Countryside; cultural Change

(上接第 10 页)

Family Gender Equality Problem and Social Countermeasures

ZHU Yaogeng¹, FU Hongmei²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 2 Hunan Wome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Abstract: With the polic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China has promoted the gender equality in family level. However, there is still problems in gender inequality, and creates problems in wom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gender equality and bisexual harmonize development in famil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lay active roles in advocating gender equality consciousness, cultivating advanced gender culture, making policy favorable to women's grow-up and improving women'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Gender equality; Family; Present; Countermeasures